



“制造”子思：郭店简公布以来子思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学术展望

李健胜

摘要：郭店简公布以来，子思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偏差。在子思生平、著述问题研究方面，一些学者有刻意前推生年、推后卒年、冠他作于子思之嫌。在史料运用方面，一些学者把明显有作伪痕迹的《孔丛子》视作真材料，形成诸如“孟子车问题”等不恰当立论，不假思索地使用作伪材料已成风气。深化子思研究要坚持史料辨析，注重考察子思思想形成与发展历程，将新材料置放到学术史研究脉络之中，而非借此“改写思想史”。合理、有效的研究不应当预设价值判断，应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认知距离，以便认清其历史形态。

关键词：子思；郭店简；生卒年代；《孔丛子》

中图分类号：B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4-0110-09

郭店简公布后，子思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子思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孔丛子》真伪等问题引起学界关注，一些研究结论不仅失当，更有“制造”子思之嫌。本文不做综合性学术述评，仅剖析郭店简公布以来子思研究存在的问题，略作学术展望，以就教于方家。

一、子思生卒年代研究存在的问题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1]¹⁹⁴⁶明言孔子之子伯鱼生年五十，孔子之孙子思生年六十二，具体生卒年代付之阙如。史籍记载，子思曾为鲁穆公师，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如果子思只活了六十二岁，就不可能为鲁穆公师。据此，蒋伯潜、钱

穆等近代学者皆认为司马氏所记有误。二人皆认为伯鱼的卒年是子思生年之上限，蒋伯潜认为子思最晚生于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5年，子思的卒年必定在鲁穆公元年之后，蒋伯潜认为是公元前406年，即鲁穆公在位的第二年^①。钱穆判定《史记》所记鲁穆公即位之年有误，当为公元前415年，而子思卒于公元前402年^②。由此，蒋伯潜认为子思活了八十九岁，钱穆认为活了八十二岁。不过，蒋伯潜所证与结论出现偏差，钱穆的结论则为学界普遍接受。

郭店简公布后，子思生卒年问题重新引起讨论，一些学者发现即使子思活了八十二岁，他和鲁穆公的交集时间仍很短促，作为幼童的子思也不可能亲炙于孔子。郭沂认为所谓子思年寿为八十二之说实属猜测，他说：“今查汉代出土文献，‘六’字字形与‘八’字显然不同，而与‘九’字十分接近，容易混淆。”^[2]²⁰他认为从《孔丛子》所记子思言行来看，孔子和子思时常讨论

收稿日期：2024-11-06

作者简介：李健胜，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 410081），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

社会、政治乃至哲学问题,这说明子思在当时“已经有成熟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了”^{[2]21}。《孔丛子·居卫》记有“子思年十六适宋”,有感于时世困厄,兼受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一事启发,故而写就“《中庸》四十九篇”^{[3]561-562}。据此,郭沂认为“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孔子卒在子思十六岁以后”^{[2]21},结合《孔丛子》中鲁穆公礼尊子思之事,他认为“子思的生年在公元前504—公元前494年之间,卒年在公元前413—公元前403年之间”^{[2]22},即子思活了九十二岁。

孔德立也认为子思活了九十二岁,除以《孔丛子》为据外,主要依从《孔子家语》《列子》等相关材料,将子思的生年提前,认为颜回卒于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伯鱼的卒年早于或同于颜回的卒年,这一年是子思生年的下限。因此,他提出:“子思当生于公元前491年,卒于公元前400年,终年九十二岁。”^[4]孙德华认为《孔丛子·记问》所记子思受教孔子涉及法治、礼乐等深奥内容,子思当时应为十岁以上孩童,以孔子的卒年来算,子思至迟生于公元前489年,依《孔丛子·杂训》记鲁穆公即位三年,向子思求教“掩恶扬善”之法,可知鲁穆公三年(公元前413年)子思仍然健在,依此推定子思最早卒于公元前413年,享年七十七岁左右^③。宋立林辨析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史记》中“六”字和“九”字并不容易混淆,他提出子思的生年大致在公元前493—公元前486年之间,卒年在公元前412—公元前405年之间^④。

此外,彭林认为鲁穆公元年系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上距孔子的卒年已七十二岁,而子思生时,孔子犹健在;《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享年六十有二,故不可能为鲁穆公师,从而得出“《六国年表》讹误颇多,不可胶执”,“孟子与子思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5]的结论。

统观学者持论,不仅怀疑《史记》所记子思年龄有误,还连带怀疑其父伯鱼年龄的真实性,而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鲁缪(穆)公师”^{[6]1723}。钱穆之所以认定子思是遗腹子,且享年八十有二,是因为依《六国年表》记载,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按钱穆考证,鲁穆公元年应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年

距孔子去世有七十二年或六十四年。如果子思享年诚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年六十二”,则子思“无缘值鲁缪”^⑤。囿于子思“为鲁缪(穆)公师”,钱穆只好将子思视作遗腹子,且将其年寿延长为八十二岁,只有这样,在鲁穆公即位的前几年,子思和他才会有交往的可能。

郭店楚墓出土的《鲁穆公问子思》与传世文献可证确系子思作品的《缙衣》同出一墓,也能反映子思思想的一些特点,不仅引起学界重视,也强化了子思为鲁穆公师这一观点。子思和鲁穆公的对谈见于《礼记》《孟子》等书,《礼记·檀弓下》记有:“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7]2822}《孟子·告子下》中有淳于髡之言:“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8]830}《孟子·万章下》中孟子亦云:“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8]721}这说明子思与鲁穆公问答作品是子思弟子门人传达子思思想主张的一种文体,类似于孔子与鲁国国君及大夫的对谈,多由弟子门人追述而成,而弟子门人追述二人对谈时,应当是把子思和鲁国元子显(即后来的鲁穆公)之间的对话以“鲁穆公问子思”的形式加以记录。二人交谈语录为子思后学记录、传承,当时子思已经去世,而储君已是鲁国国公,所以自然地将两人的对话分列为“鲁穆公”与“子思”间的对话。况且,鲁穆公为元子时,迎聘子思,尊其为“师”,当是通例,继位后仍称其为“师”则不符常理。“追述”的记载方式所记未必是原话,亦未必用当事人当初的身份来指涉,而学者们把子思和鲁穆公之间的关系固定化了之后,只好将子思的卒年“后移”,与鲁穆公继位的前几年实现时间上的交并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子思曾为“鲁缪(穆)公师”。

有学者认为子思生年九十二,所持“六”“九”二字容易混同之说自不可据,之所以比钱穆“八十二”说还多了十年,主要是想确证孔子亲自教导子思一事。如若按钱穆所说,子思为伯鱼遗腹子,伯鱼死在颜回之前,孔子已垂垂老矣,子思尚为幼童,乃祖便故去了。因此,钱穆

立论虽然解决了子思为鲁穆公师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一些文献所记子思亲炙于夫子之事,因之,他们多加的十年放在子思真实的生年之前,通过往前“拉长”子思生年,使之从幼年失怙后又痛失乃祖的幼童,一举变为少年时代便得到孔子教导的儒门中坚。

目前,在合理解释子思与鲁穆公关系,且无他证的前提之下,不能轻易否定《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子思的生年。前述学者的考证依照子思“为缪(穆)公师”一事展开,且试图确证孔子教导子思习学儒学一事,“制造”出一位早年受乃祖教导、晚年得穆公尊奉的长寿者子思。但这样既误解了子思和鲁穆公的真实关系,也使孔子和子思的生年交并关系失真。子思生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左右,不会晚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在世时,子思尚年幼,子思死于公元前422年左右,不会晚于公元前420年。子思可能做过鲁国储君显的老师,鲁穆公即位之时,子思已过世,子思生年八十二、八十九、九十二或七十七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子思著述研究存在的问题

郭店简公布之前,先秦儒学研究主要围绕孔子、孟子和荀子展开,因缺少史料或史料存在可信度问题,孔孟之间儒学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七十子往往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子思著述问题也没有引起广泛讨论。郭店简《缁衣》《五行》及《鲁穆公问子思》公布后,《荀子·非十二子》所称“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9]94},《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子思作《中庸》”^{[1]1946},《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语“《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10]等直接或间接指陈子思著述的篇目得到印证。一般而言,《中庸》是子思著作首名,后称作《子思》和《子思子》。《子思子》于唐宋间散佚,后世有辑佚本,但难窥原貌,且有串入他作的可能,郭店简诸儒书中哪些是子思及其学派的作品等问题也存在争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郭店简出土后,子思的“风头”盖过子贡、曾子、子游等孔子后学,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书《孝经》《大学》是子思

作品,《论语》也是子思编纂的。

郭店简公布后,《缁衣》和《孝经》在体例上的相似性引起关注,彭林据此提出《孝经》为子思的作品:首先,《孝经》屡称曾参为“曾子”,“子”为尊称,但曾参不可能自称“曾子”,故《孝经》不可能出于曾子之手;其次,《孝经》与《缁衣》《坊记》《表记》体例十分相近,都有屡引《诗》《书》的行文习惯,“这是子思学派特有的文风”;最后,《孝经》和子思作品的孝道观念相同,说明《孝经》出于子思之手^⑥。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曾参……作《孝经》。”^{[1]2205}《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6]1719}按古书成书的一般原理,《孝经》作者当为曾子及其门人弟子,文中所称“曾子”应当是传承、续写者的文笔。《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11]5355}《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欤)。“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11]5411}可见,孔子有征引《诗》《书》的习惯。此外,《荀子》的《大略》《君子》诸篇也屡见征引《诗》《书》。这都说明征引《诗》《书》是先秦儒家共有的文风。在《孝经》看来,“孝”是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范畴,《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2]这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13]的立论是一致的。统观《孝经》,作者主张以充分的外在形式体现孝道,这和《礼记·檀弓上》所记曾子以“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7]2776}表达对至亲者的孝思是一致的,而子思则主张“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7]2776},他和孔子一样,更注重孝的精神内涵而非外在形式。总的来看,曾子及其后学共同完成了《孝经》,子思应当不是《孝经》的作者。

《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自然是孔子后学的作品,但史籍未明确此篇作者。朱熹在《大学章句》首章之末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14]在儒家道统论的影响下,《大学》为曾子作品之观点深入人心。

郭店简出土后,郭沂重申《大学》作于子思的观点。除以“《大学》作于子思,在历史上并非

孤证独说，实乃自汉至宋明时期之成说”为据外，他主要从《孔丛子》所记子思之言和《大学》“以义为利”的一致性方面立论。《孔丛子·杂训》中，子思回答孟轲“牧民之道何先”时，提出“先利之”的看法，郭沂认为这和《大学》“以义为利”立论完全一致。假设《孔丛子》所记确为子思之言，这和《论语·子路》所记孔子、冉有到了卫国，孔子感叹“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同义，即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是教化的前提，而《大学》主张仁义就是“利”，这和《孔丛子》“先利之”的观点截然不同，郭沂却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见解”，同一时期的两个作品都有这样的观点，只能说明它们出于同一人之手。实际上，郭沂误读了上述文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他还认为《大学》“和《中庸》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就思想、概念等方面看，二者简直如出一辙”。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大学》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子思本人”^⑦。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层累出二十三种不同看法^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6]1717}这提示出，“夫子既卒”，他的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应当是指集体编纂了《论语》。清人李元度在《天岳山馆文钞》中说：“《论语》亦子思所作。纵不必尽出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15]这是较早认为《论语》由子思主持编纂的观点，近代以来，间或有学者重申此说。

郭店简公布后，唐明贵较系统地阐述了“《论语》由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这一观点。唐明贵认为《论语》的结集年代应当在孔子的再传弟子之时，结集《论语》的再传弟子肯定是曾子之门人，而子思又是曾子弟子中的佼佼者，加之二人的思想有相通或一致之处，所以他认为子思编纂《论语》“是完全有可能的”^⑨。唐明贵利用《大学》《中庸》《孔丛子》论证子思和曾子在思想主张上的一致性，却忽略了《礼记》所示二人在孝道思想上的分野，《论语》虽称“曾参”为“曾子”，但就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此书是曾子弟子编纂而成的。《论语·先进》篇云：“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16]“鲁”即迟钝之意，如

果《论语》确系曾子一系的门人编定，“参也鲁”的说法显然对曾子不利，却仍然保留在《论语》中，这足以说明至少《先进》一章的编者与曾子一系的门人无关。《春秋繁露》引《论语》，大多以“孔子曰”的形式出现，《仁义法》云：“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17]《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1]5446}董仲舒将《论语》原文中的“冉有”改为“冉子”，并对孔子和冉有的谈话做了大幅度改造。这说明，《论语》的内容及人物称谓，在汉人传抄和引述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被改动，《论语》中的“曾子”很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有意为之的，而非出自编纂者之手。因此唐明贵的立论并不可靠。

郭店简公布以后，有关子思著述问题的研究颇有“制造”子思之意味：《五行》《中庸》确为子思之儒所作，《大学》《孝经》亦为子思作品，《论语》也是子思编纂的，原先颇受冷遇的子思研究迅速引起重视，孔孟之间主要儒籍几乎全出自子思之手或由他编定。事实上，七十子有着丰富的学术创造力，《大学》《孝经》当出自其他后学而非子思之手，《论语》当由孔子弟子们在心丧三年期间集体编纂而成，子思长大后依据《论语》了解乃祖思想，他可能修订过《论语》，但不是主持编定者。

三、其他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孟子车问题”

《孔丛子·杂训》云：“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3]111}子思接见的这位孟子车“言称尧、舜，性乐仁义”^{[3]112}，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他就是战国大儒孟子。子思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孟子才出生，两人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相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清人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所言“《孔丛》伪书，不足证也”^{[8]4}。但郭沂认为“孟子车”并非孟子，而是另有其人。郭沂认为古人向来只知孟子名“轲”，但不见其字，魏晋以来称孟子字“子车”或“子舆”，“皆源自《孔丛子》”。信史未载孟子的字，单从人名角度看，《孔丛子》所见孟子车非孟

子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孔丛子·居卫》载:“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致者乎?’”^{[3]131}《孔丛子》也说孟轲求教于子思。郭沂认为《孔丛子》中的孟子车、孟轲是同一人,是战国早期的子思弟子,而战国大儒孟子的字晚出,袭自《孔丛子》所载孟轲之字^⑨。

郭沂持此观点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1]2343}之“人”为衍字,而“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2]26},换言之,郭沂以东汉之后的《孔丛子》这一晚出之书来证西汉中期写成的《史记》之误,认为孟子车“受业子思之门”的事实被嫁接到战国大儒孟子身上了。《孔丛子》所载孟子车(孟轲)“言称尧舜,性乐仁义”,对“尧舜文武之道”颇感兴趣,这和“言必称尧舜”的战国大儒孟子之思想旨趣毫无二致,但郭沂认为这是《孔丛子》流传过程中,“有人曾根据《孟子》作过改动”^{[2]26},不能因此就证明《孔丛子》中的孟子车(孟轲)就是战国大儒孟子。

郭沂认为《孔丛子》中的孟子车(孟轲)非战国大儒孟子,这一认识必定造成思想史认知的极大混乱。顺着郭沂的思路,《史记》所载孟子从学于子思之门人不可信的话,那么《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9]94}中提到的“孟轲”也很有可能不是战国大儒孟子,而是《孔丛子》中的孟子车(孟轲),因为和亲炙弟子共同构建“五行”思想的可能性比生年不相值者大得多。再顺着这一思路,郭店简《五行》基本可确定是子思及其后学作品,基于子思“仁”“义”“礼”“智”“圣”之“五行”思想形成的“仁”“义”“礼”“智”之“四端”思想当出自孟子车(孟轲)而非战国大儒孟子,那么阐释“四端”的《孟子》一书的作者当为孟子车(孟轲)而非战国大儒孟子。果真如此,战国大儒孟子岂不成了历史虚构?郭沂以《孔丛子》虚构的人物关系提出了“孟子车问题”,但是与事实可能有较大出入。

(二)《孔丛子》真伪问题

《孔丛子》是孔氏家书,为抬高孔门诸儒影

响力,杜撰了诸如孔子亲炙子思、子思教导孟子等伪托之事,两宋以来就被判定为伪书,王国维认为“其书不可信”^⑩,近现代大多数学人也认定其伪,这一点笔者已做过梳理^⑪。

郭店简公布后,视《孔丛子》为真材料者越来越多,上述郭沂、宋立林等学者为论证子思年寿、孔子与子思的学承关系等问题,皆称《孔丛子》可信。为确证孔子曾亲自教导子思,论证《孔丛子》相关记载之可信,郭沂把子思生年往前推十年,只有这样,年方十五六岁的子思才能“在饭桌上受到孔子的熏陶”^{[2]21}。郭氏提出“孟子车问题”,其目的也在于反向证实《孔丛子》为信史。宋立林承认《孔丛子》中有诸多伪托之言,但又说没有理由否定“寡人不德,嗣先君之业三年矣”之类可证明鲁穆公尊师子思等材料的真实性^⑫。

上博简出土后,人们发现一些孔子论《诗》的文献同见于《孔丛子》,《孔丛子》的真实性似乎找到了更多证据。然而,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孔丛子》所记孔子、子思等篇章是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的,所引材料渊源有自,但把这些材料揉进刻意造伪的人物关系之中,文献学价值因此被稀释,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意义也会因此消解。

总的看来,《孔丛子》是孔氏后人逐世层累而成的家书,其中关键性内容也是层累而成的,目的在于圣化孔子、子思等人。作伪痕迹如此明显的伪书,却在现当代诸多学人眼里成了信而有征的史料,他们偏采其中可以证明己意的材料并加以发挥。比如,苟东锋《从“尊贤”到“知贤”——论子思的“合外内之道”》一文,数引《孔丛子》为论据,引《孔丛子·公仪》所见鲁穆公向子思讨教兴国之策,却对《孔丛子·抗志》所载“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3]174}的记载视而不见;引《孔丛子·杂训》讨论孟子向子思讨教“牧民之道何先”之问题,完全不理睬二人有生之年不可能相见之事实;引《孔丛子·记问》所载子思问孔子“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3]95}提出“子思少年时代就关注政治问题并敏锐地发现政治实践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统治者莫不知任贤的重要,另一方面却不能用贤”^⑬。而在真

实祖孙关系背景下,这样的对话不可能发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与之相关的史料辨伪倒成了一个假问题,基于“制造”子思之需要,不假思索地引用《孔丛子》伪书材料论述子思思想自然而然地被正当化了。

(三) 孔子著述问题

孔子个人著述问题表面上看和子思研究无关,但是,随着郭店简的公布,相关儒书归属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有些学者提出其中一些篇章系孔子作品,“慎独”等原属思孟学派的思想主张连带地成了孔子的首创。于是,孔子著述问题与子思研究便有了关联。

最早提出郭店儒家竹书中有孔子作品的是廖名春,他认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等篇是孔子作品^⑤。陈来认为《尊德义》“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能就是孔子本人的论述,而由弟子传述下来”^[18]。丁四新提出:“《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性自命出》如果不是孔子本人著作,也是其弟子著作。”^[19]上述学者中,丁四新较翔实地论证了《尊德义》等诸篇郭店儒家竹书为孔子著作,并提出“那种认为孔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著作、只编述前人书篇的陈词滥调,也必将遭到否定和抛弃”^⑥。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已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安大简《仲尼曰》、湖北荆门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等出土文献证实,和《论语》类似的孔子语录于战国后期流播甚广,如若他有个人著作,更应当引人注目而广泛流传。事实上,孔子编定的六经是上古文明的文本结晶,《论语》是他与弟子们的言论合集,此外确实没有可资证实的孔子著述,这不是陈词滥调,而是事实。自疑古派受到“无限度地使用默证法”质疑以来,默证法似乎成了禁忌,事实上,合理地使用默证法是正当的,也可借此得出恰当结论。在孔子语录都能辑录且流传下来的前提下,孔子有如此丰硕的个人著作而战国中后期以来却不为人知,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这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丁四新认为现在不但可直接以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和王家嘴简等作为研究孔子思想和行事的材料,而且大量传世先秦儒家典籍中

的“子曰”“子云”“孔子曰”“仲尼曰”或“夫子曰”必将重新受到检视。如若真能如此,那么郭店简《尊德义》《成之闻之》等所见“慎独”思想,上博简《君子为礼》《颜渊问于孔子》所见“仁政”思想皆是孔子的首创,这种结合出土文献将孔孟之间儒学思想乃至战国中后期儒学主题与孔子捆绑的做法,将会引起一些认知混乱。事实上,郭店简儒家类文献总体上反映的是孔孟之间儒学的内在转向趋势,“慎独”一类的思想主张不见于《论语》,却成为这批儒书的思想主题,反映出的恰恰是基于扩充孔子思想内在性的观念创造;上博简所见“仁政”思想是孔孟之间的儒家针对孔子思想缺乏社会政治向度而有意识地延展“仁”的政治学内涵,他们的思考在孟子那里得以发扬光大。在孔子那里,无论是“慎独”还是“仁政”都还没有成为思想母题,儒家思想总体上以未展开的形式孕育在孔子思想当中^⑦,怎么可能在未成体系之前就实现了内在转向并使“仁”从人文精神转化为政治哲学?

四、子思研究的学术展望

针对“制造”子思导致的诸多问题,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修正研究思路、深化子思研究。

首先,要坚持史料辨析。由于缺乏史料,学界难以把握子思思想的总体面貌和细部特征,其思想主张及历史影响呈模糊化、碎片化状态。不惟子思研究,先秦史研究领域诸多专题皆因这个原因难以形成可信的研究结论,相关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往往既难证实也难证伪。新材料的发现可使一些专题的研究得到有效推进,郭店简发现后子思研究也取得类似效应。但是,新材料的涌现也意味着新问题的形成,一些此前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比如,前述《孔丛子》的真伪问题,在郭店简、上博简等发现之前大多数学者尚能谨慎对待,在上述简牍发现之后,在研究中不假思索地引用《孔丛子》,由此得出的学术结论让子思研究领域的史料辨析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传世史料与出土材料的互证是先秦史研究的一般方法,“互证”既可证实,也可证伪,两类文献有时存在复杂的文本互嵌和同异关系,地

下材料中可见与传世史料相同或相似的文献并不意味着传世史料一定可信,也不意味着出土材料可直接印证某种思想观念。比如,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的出土,只能说明《子思子》当中本来就有这一类语录材料,也可证实《孔丛子》摘录了《子思子》中的一些文献,但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孔丛子》摘录的这些语录是原文而无改动。其中既明示鲁穆公在位时与子思有过交往,也明示子思“困于宋”时鲁穆公过世了,研究者既不能只采信可资为证的材料,也不能对明显作伪的语录视而不见。事实上它们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子思后学编写的,也有可能出自《孔丛子》作者之手,性质类似于假托孔子之口的一些“子曰”类文献。《礼记·曲礼》有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20],海昏侯简本《曲礼》却写作“大上贵礼,其次务施报”^[21],一字之差,内涵千差万别,前者与后世儒家艳称的“尊德性”有关,后者则与“道问学”相合。研究者既不能单方面采信世传本《曲礼》认为“尊德性”必定先于“道问学”,也不能因西汉中期出现“道问学”的材料证据就否定世传本《曲礼》的史料价值。其中的文本互嵌和同异关系较为复杂,应当首先用文献学方法梳理二者的关系,辨析同篇异文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郭店本、上博本与世传本《缁衣》的篇章排序和文字皆有一定差异,看似不起眼却集中体现了原始儒家基于天道的政治秩序构想和汉代儒家基于集权统治需要的文本改作意图^⑧。因之,基于史料辨析的基础性研究及其问题意识是推动相关研究的不二法门,不仅要严格审查史料,还要注重在不同场域下同一文献发生变动的文献学依据和政治学动因,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思想史解析或许更有价值。

其次,应当注重考辨子思思想的发展历程。诸子思想的考析往往针对某个思想议题展开,子思研究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子思相关文献存在散佚问题,目前又能明确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缁衣》《五行》诸篇为子思作品,传世史料的辨伪前提和出土文献的定位需要,都决定了子思思想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诸子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阐释子思思想的过程中要先梳理清楚子思思想的发展历程,

对子思文献做恰当的时空定位,再进行思想议题阐释,这样才能在相对明确的思想发展历程中阐释清楚子思的思想主张。

子思“五行”思想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主要阐释其中的“行”“德之行”“圣智”及“慎独”等思想议题,一些研究已然有“形而上化”子思思想主张的学术特征。如若总体上梳理子思文献写作的时间前后,《缁衣》等通篇征引“子曰”类文献的篇章应当是子思早年作品,重点记录乃祖之言,借孔子之口表达思想主张,有点“述而不作”的思想史意味。《中庸》的“诚”观念及“慎独”思想集中体现了心性儒学的学术兴味及内省的道德哲学之建构与阐发,《五行》重在借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观念整合孔子思想,将乃祖之思想体系化、形而上化,使孔子思想在证成过程中形成“闭约”式的体系化趋势。见于其中的修身思想、人性论及天道观是子思认为的孔子思想,他个人的主张未必是《五行》篇的核心主题。阐释子思某个思想议题时,需要以上述子思思想发展历程定位这个议题,这样才能对诸如《五行》中的“仁”“圣”等思想内涵与子思思想的对应关系做出合理判断。

《子思子》并非出自子思一人之手,《缁衣》中的孔子语录有可能一部分是孔子原话,一部分是子思编写的,但编写依循的是孔子思想,而非子思的思想创造,所引《诗》《书》很可能是子思后学补充的,有注解孔子语录之义,但所引未必契合孔子语义。《五行》明显分为“经”“传”“说”三部分,“经”可能出自子思之手,而“传”和“说”当出自其门人弟子,用以注解子思思想。《五行》第1—15简是“经”,第16—25简是“传”,第26—50简是“说”。“经”的内容重在阐发“五行”,是子思借用“五行”思想规整孔子思想的文本创造;“传”重在解读“经”义,显示出后学以子思思想主张解读“五行”的旨趣;“说”则以君子之行疏解“经”“传”之义,属于思想实践的理论讨论。基于此,梳理子思思想发展历程时要充分考虑相关文献阐发的思想主题可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且存在不断被改写的可能。

近年来,地不爱宝,简帛文献频频出土,在何种学术框架内定位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李零曾说:“出土发现

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22]郭店简公布后,学术界“改写思想史”的声音不绝于耳,对隋唐以来由于子思文献散佚造成的子思思想“失语”问题却视而不见。由于《子思子》散佚,子思思想的总体特征和细部内涵不为人知,先秦心性儒学的发展历程也因此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历代士人多以孟子思想阐发儒家内省的道德哲学,子思思想并不是儒学阐释史的重点关注对象。不惟子思研究,七十子之学皆因文献散佚在两宋以来的儒学思想史上处于“失语”状态。郭店简公布后,尽管儒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仍存在争议,但至少子思“五行”思想是可以明确地写入思想史了。因此,有学者乐观地认为先秦思想史需要改写。事实上,思想史研究在梳理思想发展历程的前提下,更注重思想主张的历史影响,子思“五行”湮没于世,“仁”“义”“礼”“智”“信”而非“仁”“义”“礼”“智”“圣”合称的“五行”流行于世,“五行”相合为“圣”,“圣”即“天道”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对后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仁”“义”“礼”“智”相合的“四端”缺失了基于天道的终极依据,因而在思想史上被认定是人性本善的源起。郭店简《五行》公布后,只能通过改写先秦儒学学术史,使孟子人性论与子思天道思想之间的学术史缺环得以补充,但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思想史事实不可能因此改写。相应地,世传本《缁衣》所见通过文献改作贯于子思等人的维护集权统治的政治思想已然形成一定历史影响,不能因为现在能够证明它们不是子思思想原貌而取消事实上已经产生的历史影响。因之,郭店简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帮助我们重新梳理先秦儒学学术史,而非“改写思想史”,只有基于学术史的研究才能有效利用这些难得的新材料,形成有助于认清相关问题的合理结论。

最后,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认知距离。近代以来,经学的崩解、科学史观的流播使蒙在史学之上的观念因素淡化,以考证、阐释之法追索历史真相成为史学工作的主要目标。随着史学理论不断完善,史学的人文学科属性逐步得到认定和尊重,史学家不再一味

地追求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但史学研究过程和结论都以客观性为旨归也得到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子思研究是先秦儒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先秦儒学是儒学史的重要内容,经学崩解后,子思思想的官方身份消解,近代反儒学运动中,子思思想连带着受到批判。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文化价值得以重估,现代新儒家的观念立场得到更多人的正面回应,逐步形成了以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为己任的儒学复兴派。在此背景下,包括子思研究在内的一些儒学研究往往成为基于精神信仰的学术探索,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

一般来讲,史学工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夸大研究对象的历史影响,而研究对象在史家眼中的历史意义与真实的历史地位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合格的史学工作者需要抑制夸大研究对象历史影响的思维惯性,尽量客观、持正地考证、阐释研究的问题或现象。但是,在儒学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宣称儒学是他们的信仰,号召大家以“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看待研究对象,而对不以信仰为目的的儒学研究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隔靴搔痒,毫无价值意义可言。有些学者之所以热衷“制造”子思,与其儒学信仰有很大关系,受此影响史学工作者应当坚持的事实判断让位于儒学信仰包裹下的价值判断,出现失真、错位等问题在所难免。

子思研究对认清早期儒学发展史至关重要。合理、有效的研究不应当预设价值判断,而应具备持正心态,并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认知距离。基于信仰需要将研究对象内化为精神动力,其结果只能因丧失认知距离,使史学研究沦为复兴儒学的附庸,这样的研究既不符合现代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也不利于认清儒学的历史形态。正因如此,不仅要鼓励非儒学信仰者研究儒学史,也要反思文化立场与研究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纠葛,尽量以持正心态去研究子思思想及儒学思想史领域的其他问题。

注释

- ①蒋伯潜：《诸子人物考》，载《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285页。②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175页，第173页。

③孙德华:《子思生卒年新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④⑬宋立林:《子思生卒及师承考述》,《人文论丛》2018年第1期。⑥彭林:《子思作〈孝经〉说新论》,《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⑦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⑧蔡尚思:《论语导读》,载《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573页。⑨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⑩郭沂:《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⑪王国维:《中国人的境界》,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⑫李健胜:《从所载子思言行看〈孔丛子〉的伪书性质——兼说疑古派观点的价值与意义》,《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⑬苟东锋:《从“尊贤”到“知贤”——论子思的“合外内之道”》,《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4期。⑮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⑯丁四新、赵乾男:《郭店简开辟出土文献新纪元》,《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25日。⑰刘家河:《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⑱胡治洪:《原始儒家德性政治思想的遮蔽与重光——〈缁衣〉郭店本、上博本与传世本斟论》,《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郭沂.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J].中国哲学史,2002(3):18-26.
- [3]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孔德立:《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J].齐鲁学刊,2004(2):30.
- [5]彭林.郭店简与《礼记》的年代[M]//《中国哲学》编委

- 会.郭店简与儒学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4.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0]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88.
- [11]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2]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 [13]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84.
-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4.
- [1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2368.
- [1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77.
- [1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锺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254.
- [18]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3.
- [19]丁四新.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J].中原文化研究,2023(3):25.
- [20]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 [2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J].文物,2018(11):89.
- [2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

“Manufacturing” Zisi: Problems and Academic Prospects in Zisi Research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Guodian Bamboo Slips

Li Jiansheng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Guodian bamboo slips, research on Zisi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but it also has encountered certain academic deviation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 Zisi's life and his works, there is a suspicion of deliberately pushing forward the year of birth, prolonging the year of death, and attributing works to him that may not be his. In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ome scholars have mistakenly treated *Kongcongzi*—a text with clear signs of forgery—as authentic, leading to flawed arguments such as the “problem of Meng Ziche”. Using falsified materials without thinking has become a trend. To deepen the study of Zisi, researchers must adhere to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ay attention to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isi's ideas. New materials should be contextualized within the broader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rather than being used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hough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research should avoid presupposing value judgments, and maintain a certain cognitive distance from the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recognize its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Zisi; Guodian bamboo slips; birth and death years; *Kongcongzi*

[责任编辑/启 轩]